

《丝路新史》序

韩森(Valerie Hansen) 著

王锦萍 译

每当考古学家在中国发掘出一件看似来自欧洲的物品,大家都会很快假设这一定是一个从罗马到中国的商人在旅途中丢下来的。在我们脑海里隐约呈现的是一个孤独的人骑着一匹运载丝绸的骆驼的画面。但事实上,新近在丝绸之路发现的材料证明,这是个最不可能的假设。较有可能的情况是:一位本地工匠制作出一件看似来自异国的赝品,而或是流亡人口、或是强盗、或是使节则试图把这件物品带到他们所到的下一城镇出售。

本书(译者按:即《丝路新史》)是以实证为基础,尤其是利用丝绸之路上其中七个地点(六个在中国西北部、一个在撒马尔罕[Samar-kand]外围,位于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发掘出的文书和文物写成的一部丝路(所谓“丝路”,即连接中国与世界各地的多条陆路)新史。以下是本书一些最令人诧异的发现。

在这些陆路上,丝绸既非最重要更非唯一的贸易品。金属、香料以及玻璃在欧亚大陆都有流通。令人意外的是,硝砂(ammonium chloride)在许多存世的文书中都有出现:它既被用于染色的定色剂,也被用作金属冶炼的熔剂。中国公元前2世纪发明的纸张,在公元8世纪首先流传到伊斯兰世界,到14世纪晚期才流传到阿尔卑斯山北部的欧洲地区^①。

^① 布鲁姆(Jonathan Bloom),《印刷出现以前的纸张:伊斯兰世界中纸张的历史和影响》(*Paper Before Print: The History and Impact of Paper in the Islamic World*),耶鲁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

纸张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无疑远远大于主要用于制衣的丝绸。奇怪的是,我们并没有因此称这些陆路为“纸张之路”(The Paper Trail)。也许我们应该这样做。

虽然有些物品早在公元前 1000 年就跨越了欧亚大陆,但它们在抵达目的地前其实可能已经在“滴沥贸易”(trickle trade)^①中转手多次。在罗马帝国时期中国与罗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直接贸易。罗马人并没有拿他们的金币来换取中国的丝绸。在中国发现最早的罗马金币是拜占庭时期的苏勒德斯币(solidus)。它们被发现的地点是一些年代可被确定为 6 世纪的坟墓,后者的建造时间亦即远远晚于君士坦丁皇帝(公元 312—337 年在位)将首都从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的年代。

事实上,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居住在今天伊朗周围的不同人口,而该贸易的高峰期则出现于公元 500 至 800 年之间。现有出土文书中大部分点名提到的商人,不是本身来自撒马尔罕地区,就是来自于该地区的人的后裔。他们所说的语言是一种称作粟特语(Sogdian)的伊朗语,而他们之中有许多会遵守古代伊朗宗师索罗亚斯德(Zarathustra,约公元前 1000 年;希腊语称为 Zoroaster)的教义,其中之一是诚实是最重要的美德。过去 10 年最令人兴奋的发现,要数在中国内地主要城市(包括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所发掘出属于粟特领袖的坟墓。这些坟墓所展现的索罗亚斯德教的死后世界,其细致程度要远远超过伊朗世界现存任何艺术品的描绘。

无论是中国王朝还是环绕中国西北塔克拉玛干(Taklamakan)沙漠的绿洲国家的统治者,不但对贸易有严格管理,亦是货品和服务的主要买家。因此,中国在中亚驻军时(主要在汉代[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20 年]和唐代[618—907 年]),贸易亦随着激增;反之,贸易亦随着衰落。

很少人会在丝路走一段如从撒马尔罕到长安(将近 2 千英里[3

^① 是康奈尔大学的塔利亚科佐(Eric Tagliacozzo)教授介绍给我的用词。

千公里])般漫长的路程。尽管如此,丝路上最有名(但未必最可靠)的旅人马可·波罗(1254—1324)声称他从欧洲一直走到中国,然后从海路返回欧洲。

商人只是丝路上几类行旅中的一类,而其他类型(尤其是流亡人口和外交使节)在人数上要远远超过商人。而驴子和马匹较之骆驼则可驮载重量更大的货物。

丝路上的社群(communities)大都属于定居型(sedentary),也就是说大部分人是从事农业而非贸易。可说得上的贸易主要是地方性的和以实物来作交换的交易。人们在他们的出生地度过生老病死。正如下文将提到,丝路上许多社群大量来自中国内地以及西部边远地区的移民。

外来移民为丝路上的居民引进了他们家乡的各种宗教。起源于印度并在中国广泛流传的佛教固然影响最大,但道教、摩尼教、索罗亚斯德教以及景教都各自有其追随者。在这些信仰体系从一个文明传到另一个文明的过程中,丝路的居民无论在传播、诠释以及调整工作方面都起了关键作用。在伊斯兰教到来之前,不同社群的居民对彼此不同的宗教信仰有着令人惊讶的宽容态度。个别统治者或会对某一宗教情有独钟,并强烈鼓励其子民追随其信仰,但他们亦会允许外来居民信奉后者从家乡带来的宗教。

简而言之,这些新的发现让我们再次认清到斯坦因(Aurel Stein)和其他早期探险者在其铲子深入泥土那一刻已经领会到的:丝路容许了思想、技术及艺术题材的传播;物品的流通反而是其次。

* * *

出土文书在本书中占有一个中心位置,因为它们提供给我们难得的机会去洞悉丝路上一般人的生活。理由是:这些文书是循环再用的废品。丝路的居民很少会销毁纸张;相反,他们会收集并将它们循环利用。有字的纸张最后成了纸鞋的鞋底、纸糊的塑像以及其他用来埋葬的物品。文书用多种语言写成,如梵文、古汉语,以及其他一些只有

少数学者能理解的死语言。当考古学家用蒸汽把这些文物分开时,隐蔽的纸张层就被分离出来,并展露出写在它们上面的秘密。让考古学家诧异的是,他们正在阅读着有关布匹价格、财产纠纷、医药处方以及超过1千年前某一市日一个女奴价格的记载。

这些文书让我们有机会识别出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交易的主要货品、沙漠旅队的大致规模,以及贸易对所经过地方的影响。这些文书亦让我们有机会追溯丝路尤其在(流亡人口因逃避战乱而要流离失所时所带来的)宗教信仰及技术方面更广泛的影响。

作为一个形容欧洲与中国之间陆上贸易的名词,“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是由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男爵在1877年所创)无疑展示了强大的持久力。但尽管其魅力无穷,“丝路”一词终究是有误导成分。它暗示有一条单一的、清晰的、可通行的路线,但事实上连接着欧洲与中国的是许多不同的陆路。“丝绸之路”不是一条我们一般所说的道路,而是由一些若隐若现的路径以及一些没有任何标记、或穿山越岭、或横跨大片荒地的荒凉小径所凑合而成。只有在个别地方这些蜿蜒的路径才会在山口和绿洲交汇:这些就是我们要探究的城镇。

任何想要穿越欧亚大陆的人都面临着令人畏惧的地理上的障碍:世界上最高的山脉、西伯利亚大草原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古代第一批穿越这个大陆的勇敢的人们知道在雪少的夏天在哪儿跨越山口,以及怎样在阳光不是太毒的冬天穿过沙漠。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绕着沙漠的边缘走,这样可以在前方的沙漠绿洲聚落里稍作停留来饮水、休息以及获取路线的信息。这些聚落每一个都靠近一条河流,而这些河流则都位于顶部被雪覆盖的大山的山脚下。(今天在这个地区的上空飞行的话,我们只能认出一些最高山峰来定位一些河流的主要发源地,而这些河流曾经哺育了丝路上的主要城镇。)

所有出了中国的陆上路线都开始于一条被适宜地称为“河西走廊”的600英里(1千公里)长的路程,这段路程跨越了青海的山脉和蒙古北部的戈壁沙漠。在位于甘肃省的绿洲城市敦煌,行旅往往选择

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边和南边两条路线行进。如果两条路线都无法通行的话,行旅只能选择一条横穿世界上最不适合居住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间路线。塔克拉玛干沙漠确实非常难于穿越:流动的沙丘完全覆盖了85%以上的沙漠表层,在这样的地方一个人很容易迷失方向。所有这些路线都在喀什(Kashgar)交汇。

当旅行的人们到达沙漠西边的末端时,他们必须攀登将塔克拉玛干沙漠从所有的西部和南部地区隔离出来的高耸的山峰。在那里地球上最大的山脉在冰雪覆盖的帕米尔高原交汇。从这些高耸的山峰出发,旅行者可以往西到达撒马尔罕,往南到达印度。

今天敦煌和撒马尔罕之间的地区吸引了许多旅客,他们去参观许多著名的包括已经深埋在沙漠中的遗迹,如城墙围绕的吐鲁番古城,以及敦煌和库车(Kuche)的千佛洞。地方上的博物馆呈列了从坟墓中发掘出来的文物,如金银容器以及结合了东西方艺术主题的有着生动精致的设计的纺织品。在许多地方,沙漠的干燥气候保存了或普通或在视觉上惊人的文物:石化了的中国式饺子和中东地区的面包块被埋在一起,而这些东西在1千多年的古代丝路上正是为旅行者所消费的。

发现这些文物文书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在中国新疆的南部地区,也包括西至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和塔吉克斯坦,东至中国甘肃和陕西省的部分地区。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国人习惯上将这个区域称为“西域”。在18世纪清朝政府征服这个地方并将其划入帝国版图之后,他们将这个地方命名为新疆,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①。集中了丝路上最重要考古发现的七个地点并非都在新疆境内。其中五个地方(尼雅[Niya]、克孜尔[Kizil]、吐鲁番、于阗[Khotan]以及敦煌)在中国的西北部,国穆格山(Mount Mugh)在今天的塔吉克斯坦,最后一个地点是唐朝的首都长安,位于中国中部地区的陕西省。

^① 濮德培(Peter C. Perdue),《中国向西进发:清朝对中欧亚的征服》(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哈佛大学出版社,2005年。

这些不同文书的发现是我们故事中重要的,也是有吸引力的一部分。在19世纪晚期,没有人意识到新疆的沙丘中保藏着从远古以来的许多文书文物。1890年英国的鲍尔(Hamilton Bower)中尉为了调查一宗谋杀案,来到了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路线的一个名叫库车的绿洲。他在那里买了一个用古代的文字写在51片桦树皮上的古写本。1891年孟加拉的英国皇家学会获悉了这一发现。在随后的几年内,学者们鉴定出这是一个5世纪时期的医书。这个已有1千多年历史的写本随即成为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梵文写本^①。常驻在亚洲的欧洲官员们充分意识到这些发现的重要性,他们开始购买不同的古代写本(有些其实是赝品),并将他们寄给欧洲的文献学家进行解读。

1895年瑞典探险家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开始了在新疆的第一个科学考古发掘,在此之前许多古代写本已经被发现。赫定在这年的4月离开麦盖提镇(Merket, 位于叶尔羌[Yarkand]河边),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探寻于阗河的源头。半个月之后,赫定发现他没有带足够的水来供应他自己和四个随从的需要,但是他没有因此回头。当他们的水用完之后,他开始不顾一切地在沙漠中寻找水。他的随从和骆驼相继倒下了,而精疲力竭的赫定则强迫他自己沿着一条干枯的河床继续爬行。到了绝水的第六天,他终于在沙漠中发现了一条溪流,他在靴子里装了足够的水,并以此救了一个随从的性命。

当赫定躺在沙漠中恢复体力的时候,他看到四个商人和许多牲畜组成的一个商队。他向这些商人买了三匹马、“三个驮鞍、一个马鞍、一些马嚼子、一袋玉米、一袋面粉、茶、水壶、碗以及一双靴子”^②。当他走出沙漠之后,他获悉牧羊人救了他的另一个随从,但其他两个随从则已经死了。

^① 霍普柯克(Peter Hopkirk),《丝绸之路上的洋鬼子:寻找中国中亚地区失落的城市和宝藏》(*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The Search for Lost Cities and Treasures of Chinese Central Asia*),麻州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5—46页;《孟加拉英国皇家学会会议报告》(*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1890年,第221—223页,图版(plate)3。

^② 赫定(Sven Hedin)著,许布希(Alfhild Huebsch)英译,《我作为探险家的经历》(*My Life as an Explorer*),讲谈社(Kodansha America),1996年,第177页。

历经磨难的赫定在这年的12月又回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次他带足了水。他从于阗进入沙漠,并发现了丹丹乌里克(Dandan Uiliq)古城废墟。一些佛教雕塑躺在那里的木柱残垣之间。赫定并没有发掘,他后来解释说:“我没有足够的装备来进行一次彻底的发掘,另外,我也不是考古学家。”^①当时欧洲的报纸大幅度报道了赫定在塔克拉玛干干的探险,这次探险就像今天的太空探险一样既危险,又充满了异国情调。

1897年年底一个波兰煤矿工厂的经理将一份这样的新闻报道寄给了他当时在印度的英属殖民地城市拉合尔(Lahore; 现今在巴基斯坦)当教育官的弟弟——斯坦因^②。斯坦因是匈牙利人,1883年他在德国土宾根(Tübingen)完成了梵文的博士学位。在住在拉合尔的10年时间里,斯坦因跟随学问渊博的印度学者戈文(Pandit Govind Kaul)继续学习梵文。我们今天大概不知道梵文在整个19世纪都是一个非常流行的领域。梵文当然是古代印度的语言,但它也是印欧语系中比拉丁语和希腊语更为古老,却又密切相关的语言。斯坦因在德国学习的时候知道了获得最完整和最早的写本的重要性。

斯坦因立即意识到赫定的发现对研究存在于其最初背景中的古代写本的意义,他随即向英国考古机构申请资金前往于阗。他指出,对这个地区进行系统的考察会比已经出现的掠夺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另外他也暗示对古代文物的国际性竞争已经开始了。他写道,赫定是一定会回到这个地区的,而俄罗斯人也在考虑组织一次探险。结果,英国驻印度政府批准了他的申请。

斯坦因的名字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会频繁地出现,因为他是第一个对本书讨论的地方进行定位并绘图的人。另外,他也发现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文物和文书。作为从1900年到1931年四次新疆探险的领导者,斯坦因写了大量的考古报告和随笔。在很多个案中,我们可能希

^① 赫定,《我作为探险家的经历》,第188页。

^② 米尔斯基(Jeannette Mirsky),《斯坦因爵士:一个考古探险家》(*Sir Aurel Stein, Archaeological Explorer*),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70、79—83页。

望他的发掘更系统一些。他雇用了工人进行发掘,如果工人有任何发现就会得到额外的奖励。这种普遍的惯例导致有一些发现过于仓促。但是没有任何其他在新疆发现文书的探险者(包括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德国的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以及日本的大谷光瑞)能够比得上斯坦因考古报告之详细程度。也没有任何其他人像斯坦因那样到过那么多的地方,发表了那么多的资料。

我们必须经常依赖斯坦因对每一个地方的描述来复原其本来的环境。他对埋藏文书的状况的解释也非常重要,其重要性并不在于其权威性,事实上,在许多个案中,学者们已经纠正了斯坦因的分析。其重要性在于每一位后来的学者都是从利用斯坦因的报告开始的。这些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外国人的记述提供了很多信息,因为它们作者们,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是同更早时期的旅行者一样沿着同样的线路,使用同样的交通方式旅行的。他们的记述提供了许多古代旅行者未说的信息,这使得我们有可能重构他们在丝路上旅行的经历。

早在公元前1200年,居住在新疆地区的不同民族的人们已经开始从事远距离的陆上贸易。在那个时候,商朝(公元前1766—公元前1045年)的国王们统治着黄河下游流域,并使用现存最早的汉字进行书写。在其中一个商王的妻子妇好的豪华坟墓中,埋藏着1千件以上的玉器,其中有一些是用有于阗(即和阗玉)特征的玉石雕刻成的。而于阗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主要绿洲之一。在哈密附近的五堡发现了同时期的大量海贝壳,这表明在该时期该地区与或东至中国,或南至印度,或西至地中海的沿海地区已经之间存在着贸易关系^①。

至今在新疆和甘肃地区已经发现了从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初数世纪的500多具因干燥的沙漠气候保存下来的干尸^②。这些干尸中许

① 王炳华,《“丝绸之路”的开拓及发展》,收氏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页。

② 马劳瑞(J. P. Mallory)、梅维恒(Victor H. Mair),《塔里木干尸:古代中国与最早期东来人类之谜》(*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桑姆斯与哈德逊(Thames and Hudson),2000年,第179—181页。

多男性尸体身高超过1.8米,要远远高于同时期的中国人。此外,死者通常有着非中国人的身体特征,比如金黄色的头发和白皙的肌肤,这样的特征有时被称为高加索人种(caucasoid)。他们的外貌使得学者们提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不同绿洲间居住往来的许多人是说印欧语言的民族的后代。语言学家们相信这些民族很可能在公元前2000至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从他们在里海(Caspian Sea)附近的家乡迁移到了古代印度和伊朗。一些干尸穿着格子花纹的羊毛织物,这些花纹与爱尔兰的式样非常类似,有的学者认为这进一步证明这些干尸的印欧人种的根源^①。

西域和中原的贸易在此后的时期里一直持续着。在公元前5世纪时,中国人与北方民族进行着贸易往来,如居住在西伯利亚的巴泽雷克(Pazyryk)的民族,他们在墓葬中陪葬着中国的铜镜和丝绸^②。其中一丝绸残片绣着凤凰图案,非常类似于中国的式样(或者说从某些最初为中国的式样复制而来的图案),因为凤凰在中国文化中给人积极的联想。吐鲁番也出土了一件公元前5世纪时期的相似的纺织品,这件纺织品在已褪色的黄色丝绸上绣着精美的凤凰^③。这些发现表明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里陆上贸易显然已经存在了,但是文书材料的缺乏使我们很难知道究竟是谁为了什么在携带着这些货物。

第一份描述丝路贸易的文字记载描写了张骞(死于公元前113年)在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在位)统治时期出使中亚的旅程。汉武帝希望张骞能说服居住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Ferghana)地区的月氏人与汉朝结盟,以对抗他们在北

① 巴伯(Elizabeth Wayland Barber),《乌鲁木齐的干尸》(*Mummies of Ürümchi*),诺顿(W. W. Norton)出版社,1999年。

② 鲁登考(Sergei I. Rudenko)著,汤普森(M. W. Thompson)英译,《西伯利亚冻结的坟墓:铁器时代骑士在巴泽雷克的墓葬》(*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加州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115页,图55(铜镜);图版178(丝绸上的凤凰刺绣)。

③ 王炳华,《“丝绸之路”的开拓及发展》,第4页;阿拉沟的发掘报告,载《文物》,1981年第1期,第17—22页;丝绸可见新疆文物局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5页,图0427。

边共同的敌人,即立足于蒙古地区的匈奴部落联盟。现存最早的有关张骞的记载至少是在他出使西域的150年之后才被写成,我们不知道有关他此次旅程的许多最基本的事实,包括他抵达费尔干纳流域的路线。

当张骞抵达时,匈奴人监禁了他。张骞要一直等到10年后才设法逃了出去。张骞大概在公元前126年回到汉地,他给汉武帝提交了中国人拿到的有关中亚不同民族的第一份详细资料^①。张骞极其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商人和贸易物品在他去之前已经到了中亚。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市场上,他看到了产于数千里之外的四川地区的竹子和布。看来中国的物品曾从四川经陆路被运到了阿富汗。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汉朝逐渐地扩大了对西北地区的控制。在公元2世纪时,汉朝控制了河西走廊和敦煌。中国军队每次征服一个新的地方就会按照固定的间距建造烽火台。如果动乱爆发,烽火台的驻军就会点燃火把来警示下一个烽火台的人,这样依次传递下去,直到消息被送到第一个能够派兵到动乱地的军营。除了烽火台之外,汉朝的军队还在新征服的地区设置卫戍部队。在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甘肃金塔县东北90公里)和疏勒(今甘肃省敦煌和酒泉附近)发现的竹筒记载了军队向当地居民购买布匹谷物的事情^②。

在敦煌以东64公里的悬泉地区发现了丝路上最大的早期文书储藏点,这个储藏点正是这样一个中国的驿站和驻军地^③。一个边长50

^① 张骞出使西域最早的记载,可见《史记》,卷123;《汉书》,中华书局版,卷61,第2687—2698页。何四维(A. F. P. Hulswé)认为《史记》的记载可能是在丢失后再从《汉书》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可参看其《中国在中亚的最初阶段:公元前125年—公元23年》(*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 B. C. - A. D. 23.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hapters 61 and 96 of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布里尔(Brill)出版社,1979年,第15—25页。他翻译的《汉书·张骞传》见第207—238页。

^② 王海岚(Helen Wang),《丝绸之路上的钱:从公元800年左右前中亚东部所得的证据》(*Money on the Silk Road: The Evidence from Eastern Central Asia to c. AD 800*),大英博物馆出版社,2004年,第47—56页。

^③ 悬泉文书在1987年被发现,到1990和1991年被正式发掘。悬泉的文书数量惊人,目前已经出版的只占一小部分。可参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之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2000年第5期,第4—45页;该地的地图见第5页,竹筒总量见第11页。

米的土墙围着一座建筑,这座建筑的南边有一个马厩,在其北边和西边是垃圾坑,西边的垃圾坑最深,直至地下1.2米。当时的居民在不同的垃圾坑里埋了垃圾和文书。从这个点出土了2650件文物,包括钱币、农具、武器、铁制的车零件、梳子、筷子等器具,谷物、大蒜、核桃、杏等食物,以及动物骨头^①。

悬泉遗址出土了3万5千件以上的废弃文书,其中2万3千木简写有汉字,1万2千件空白的简显然是留作后用的。将近2千件简标明了在公元111年至公元107年之间的纪年。

这些简都写在木片和竹片上,因为纸张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流传到中亚。中国人在公元前2世纪时发明了纸张。纸张最初被用作包装材料而非用于书写。例如,据正史所载,公元前12年一件谋杀案中的毒药是用纸张包裹的^②。悬泉发现的一些纪年为公元前1世纪的最早的纸片,带有药物的名称,这证实了纸张首先是被用来包药粉的。

直至四个世纪之后,在公元2世纪时,纸张才开始普遍被用作书写材料。在丝路上纸张代替木片和竹片作为最常用的书写材料则要更晚。纸张一直都比较贵,结果人们还用皮革和树皮等其他材料进行书写。悬泉的文书主要包括串成一束束的木简。悬泉书写木简的人对不同种的木头进行分类:他们用质量最好的松树简来写皇帝的诏令,用易歪曲的白杨木和柳树的简来写常规的文书和信件。

悬泉遗址发现的文书包括悬泉驿站和邻近地方官员之间的日常通信,皇帝新颁发的诏令,缉拿潜逃罪犯的布告,以及私人信件。悬泉是敦煌之前通往东方的最后一个驻地,几乎所有进出汉朝的外交使节都会在旅途中两次经过悬泉。汉朝以来中国的地理资料列举了50多个中亚的王国。尽管汉语资料通常将这些地方的统治者成为国王,他

^① 何双全,《双玉兰堂文集》,兰台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② 钱存训(Tsien Tsuen-hsuei),《造纸及印刷》(*Paper and Printing*),收为李约瑟(Joseph Needham)编,《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5卷:《化学和化学技术》(*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第1册,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0页;《汉书》,卷97下,第3991页。

们的领域经常只包括一个绿洲,人口少至 700,最多也不超过 7 千。这些绿洲与其说是王国,不如说是小的城邦国家^①。

中亚大大小小的王国都派使节前往中国的首都拜见中国的皇帝,并进贡礼物。他们承认自己是中国的皇帝的属下,并且获得礼物作为回报。在中亚草原上放牧漫游的马通常比养在中国的马要强壮。中国的马往往小而弱,这是因为它们食用的是人工运到马厩的饲料。中国人最珍视费尔干纳的天马,并将其称为血汗马,因为有一种寄生虫附在马的身体上使其汗呈现血红色。即使是在汉代这样非常早的时期也是不可能区分官方贸易和私人贸易的。在这里官方贸易指使节进贡常为马或骆驼的礼物,并代表其统治者获得礼物作为回赠,而私人贸易则指使节将同样的动物送给中国人,但将获得的回赠据为己有。

中亚王国进贡礼物的使节团在规模上有大有小。在某些场合使节团可以达到 1 千多人:于阗国王曾率领着一个 1714 人的使团^②。更为典型的是来自位于今天撒马尔罕的粟特王国的使团。在公元前 52 年的一个使团包括了两名使节、10 名贵族,以及许多未详细说明的随从,这些随从带着 9 匹马、31 头驴、25 头骆驼,以及一头牛^③。

这些使团沿着固定的路线前行,并且随身携带通关文书,这些通关文书按顺序列出了他们被允许通过的城镇。一些悬泉文书列出了从汉帝国的第一个城镇敦煌至公元前 1 世纪时的首都长安,或公元 1 世纪时的首都洛阳之间所有的站点。使团成员不能偏离这些固定的路线。在每一个站点,官员们都会清点每一个使团的人数及跟随他们的牲畜数量,以确保他们都是通关文书上所列的使团成员,如此才允

^① 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塔里木盆地的古代城邦》(Ancient City-States of the Tarim Basin),收汉森(Mogens Herman Hansen)编,《30 个城邦文化的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irty City-State Cultures),丹麦皇家科学院(Kongelige Danske Videnskabernes Selskab),2000 年,第 393—409 页。

^② 胡平生、张德芳编,《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110 页。

^③ 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收荣新江、李孝聪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50 页,转录和解释了悬泉文书编号 II90DXT0213^④:6A。

许他们继续前行。当这些使团经过悬泉去往中国时,官员们会如此检查一次,通常在六个月之后这些使团离开悬泉回中亚时,官员们会再检查一次。

悬泉文书中最长的一份记载了公元前 39 年的一件纠纷事件。当时四位粟特使者向中国官员陈诉以抗议他们出售骆驼时所得的低廉价格。这些粟特人声称中国官员付给他们的是瘦黄的骆驼的价格,而他们实际上交货的是能卖个好价钱的肥壮的白骆驼。这些粟特使节非常清楚不同种类的动物价格,而且他们对价格偏离实际价值时进行抗议的制度的可预见性有相当的自信。粟特人还期望当使节携带国书时能够在沿线的每一个站点被供应食宿,但是他们往往得自己支付膳食费用。悬泉的厨子们保留了按每个客人的地位和出行方向(或东或西)所供应的食物支出的详细记载,这些客人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①。

听取公元前 39 年的这件纠纷诉讼的敦煌官员得出的结论认为,粟特人所收到的报酬是合理的。中国的历史学家王素针对使节所受到的苛刻待遇给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汉朝的官员们憎恨粟特人,因为他们与匈奴合作,于是他们用少付给粟特人钱来进行报复^②。

悬泉文书描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包括远在中国西部边陲的绿洲,这些绿洲有的邻近今天的喀什市,也有的在如今中国的国境之外,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些不同的中亚绿洲的统治者参与了中西外交使节的系统化的往来。在东方有着汉帝国,来自不同地方的使节们固定地经过丝路前往中国的首都。

如悬泉文书所揭示的,汉朝始创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常规贸易路线完全是因为其战略因素:他们要找到通往中亚的其他路线来绕过他们的死对头匈奴。在刚开始的时候,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不是个别的商人,而是代表统治者的官方使节。他们可能偶尔参与私人贸易,但

^① 胡平生、张德芳编,《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 77—80 页,悬泉文书编号 I 0112^④:113—131。

^② 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第 155—158 页。

通常只是作为他们官方行为之外的副业,而他们的活动也不是自发的。他们,包括了列在通关文书上跟随他们的人和动物,在跨越中亚到中国都城的漫漫远程中必须沿着固定的路线前行,一点也不能偏离。

悬泉文书详细记载了中国和中亚绿洲之间的贸易往来,但没有提到过任何贵霜帝国(阿富汗以北和巴基斯坦)以西的地方。考虑到罗马帝国和中国之间有名的奢侈品贸易,这样一个结果似乎有点惊人。不幸的是,在欧洲范围内的贸易路线上没有发现任何可与悬泉文书的详细程度相媲美的文书,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已有的文本来分析贸易。信息最为丰富的一本书是《航海记》(Periplus),这本书由一个居住在埃及的无名的商人在公元1世纪的某个时期用古希腊语撰写^①。在描述了埃及东部、阿拉伯、印度的不同港口之后,这本书以一段对古代罗马以外的领土的描述告终:

在这个地方(恒河以东大海中的一个岛屿)以外,迄今最北的地方,在大海的边缘,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内陆国家叫做 Thina。从那里丝棉、纱、布从陆上经过恒河运到……要去 Thina 非常不容易,因为很少有人从那里来,只有极少的个别人。^②

“Thina”的发音要懂古希腊语才能弄明白。古希腊语中没有“ch”的音,所以作者只能选择一个“th”或“s”的音来作为该地名的首字母,而这个陌生的地名也是作者从印度商人那里听来的。他于是选择了

^① 拉西克(Manfred G. Raschke),《罗马与东方贸易的新研究》(New Studies in Roman Commerce with the East),收坦普利尼(Hildegard Temporini)编,《罗马帝国兴衰史:从新发现透视罗马的历史和文化》(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 Welt: Geschichte und Kultur Roms im Spiegel der neueren Forschung),第2部分第9卷第2分部,赫勒伊特(Gruyter)出版社,1979年,第604—1361页。至于作者为什么认为《航海记》一定是在公元70年之前写成,见第755页,注478。

^② 卡松(Lionel Casson),《对〈航海记〉文本的介绍、翻译和注释》(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 Text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1页。

“Thina”。(在梵文中,中国被称为“Chee-na”(从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而来);梵文单词是英文“China”的来源。)作者能肯定的有关中国人的信息只有一个要点,那就是他们用茧来生产丝棉形式的丝,用丝棉纺成丝线,然后用丝线织成布。

中国人确实是世界上第一个制作丝的民族,如果一个关于桑蚕主题的象牙雕刻能证明当时的丝绸生产产业的话,那么中国人制丝很可能是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开始了。据杭州丝绸博物馆所说,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丝绸残片来自于中原的河南省,纪年为公元前3650年^①。另外有的专家认为最早的丝绸应该来源于公元前2850年至公元前2650年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公元前3310年—公元前2250年)^②。

当公元1世纪《航海记》被写成的时候,罗马人还不知道丝是如何制造的。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23—79)写道,在公元1世纪之前,丝衣已经出现在罗马。普林尼对丝绸生产有一个著名的错误认识。他认为丝是由“粘附在树叶上的白色绒毛”制成的,Seres人将其梳理出来制成线。但是在另一段文字中,他又提到了蚕^③。现代学者经常将“Seres”翻译成中国,但事实上对罗马人来说,它代表了世界北部的未知的领土。

在普林尼的时代中国不是唯一一个能生产丝的国家。在爱琴海东部的希腊寇斯岛(Cos)也生产丝,被称为寇丝(Coan silk)。寇丝在很多方面与中国的丝有所不同:寇丝的线来源于一种野生的蛾子,而非中国人很久以前就驯养的家蚕。寇丝由野生蛾子孵化飞走后留下的破茧纺成。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中国人就将茧煮熟,将蚕蛹杀死。

^① 我在2006年6月12日参观了该博物馆。最早的丝绸残片来自于河南省荥阳青台村。

^② 英文著作中对中国丝织物最深入的研究是库恩(Dieter Kuhn),《纺织技术:纺纱与缫丝》(Textile Technology: Spinning and Reeling),收为李约瑟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化学和化学技术》,第9册,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72页。

^③ 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著,博斯托克(John Bostock)、赖利(H. T. Riley)英译,《普林尼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Pliny),博恩(H. G. Bohn)出版社,1855—1857年(全文载网址: <http://www.perseus.tufts.edu>),第6卷,第20(纺织丝绸的女子)、54(长在树上的丝)、101页(钱币的出口);第11卷,第75页(蚕)。

结果,茧就保持了完整,可以从茧中抽出长长的连续不断的细丝。即便如此,中国的丝也不是总能与野生的丝区别开来,因此很可能普林尼抱怨的是寇丝,而不是中国的丝^①。

普林尼不能理解为什么罗马人花了大量的钱来进口丝织品,而结果让女性的身体的很大一部分暴露在男人的眼前!他对丝绸的抨击必须要从当时的背景中去理解:他同时也抱怨其他的进口物品,如乳香、琥珀、玳瑁等,因为这些奢侈品的消费会削弱罗马的国力^②。学者们一致认为普林尼不可能估计罗马人花在购买丝绸上的钱的数量,因为官员们并没有收集此类贸易的数据^③。

普林尼的评论给我们一个印象,似乎罗马帝国和汉朝之间存在着大规模的贸易,但是在中国方面几乎没有证明此类贸易的证据存世。如果中国和罗马之间的贸易曾经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应该可以期待在中国发现罗马的钱币。而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欧洲钱币是来自于拜占庭帝国,而非罗马帝国,时间大概是在东魏时期(534—549)^④。相反地,含糊不清的传言是,在中国没有发现任何罗马钱币。而与此相比,在南印度沿海地区发现了成千上万的罗马金币和银币,这表明罗马商人一定曾经经常去那里。

货币史学家经常认为贵重金属铸造的钱币在一定的时期内可能在两个地区之间流通,而在今天则完全消失,这是因为它们被熔化掉

^① 古德(Irene Good),《关于汉代以前欧亚大陆的丝绸问题》(On the question of Silk in pre-Han Eurasia),载《古文物》(Antiquity),第69卷(1995年),第266号,第959—968页。

^② 墨菲(Trevor Murphy),《老普林尼的自然史:百科全书中的帝国》(Pliny the Elder's Natural History: The Empire in the Encyclopedia),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6—99(奢侈品)、108—110页(赛里斯[Seres])。

^③ 拉西克不相信罗马帝国会有任何人收集此类统计,并认为普林尼为道德原因而夸大了事实(见《罗马与东方贸易的新研究》,第634—635页):“因此,根据罗马的官僚政治惯例以及埃及留下来的记录,老普林尼是不可能得到任何关于罗马对东方贸易的年度收支平衡的确实数据”(第636页)。另见邢义田对拉西克一书的书评(载《汉学研究》,第3期[1985年]第1卷,第331—341页);以及邢氏在一篇续编(载《汉学研究》,第15期[1997年]第1卷,第1—31页)提出对罗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的规模的深切怀疑。

^④ 罗丰,《汉胡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17—120页列出了在中国发现的金币。

了。但是在中国发现的晚期的大量非中国货币削弱了这一观点。中国的考古学家发现了公元330年之后铸造的拜占庭钱币,但所有这些所谓的拜占庭金币几乎都是中国境内制造的复制品。最典型的是,复制这些钱币的中国工匠们经常犯一些泄漏底细的错误,表明这些钱币是赝品。比如,他们可能将某个统治者的脸描绘得很瘦,而真品则显示他其实长着一张胖脸。或者,工匠们将钱币背面的星星作得太大了。又或者他们在铭文上犯了错误^①。将这些钱币埋在坟墓中的中国人常常将它们作为装饰:这些钱币有两个孔,一个在底下,一个在上面,这样它们就可以被缝在衣服上当作幸运符。

撒珊帝国(Sasanian empire; 224—651)铸造的伊朗银币比拜占庭钱币更多地保存了下来。银币和金币在6至7世纪时同时在流通,但它们的使用方式是不同的。保留下来的金币数量非常小(五枚金币集中在一起的已是最大的发现),而撒珊银币在某个储藏点可达到数百枚。

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可以质疑罗马和中国之间贸易的规模。正史记载了许多向汉朝皇帝进贡礼物的外交使节,但只有一个人可以让人相信是来自罗马。166年一位来自大秦的使者从海上到了中国,并进贡了象牙和犀牛角等礼物,这些是典型的东南亚产物。如同“Seres”在罗马人心目中的概念一样,大秦在中国人的地理思想中处于相似的位置,即位于已知世界的边缘,并且表现出一个理想世界的许多特征。许多人怀疑这个使者是一个冒充者,他声称来自于一个遥远的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地方,目的是为了得到贸易的许可。这一点非常有意思,但并非无可置疑^②。

在罗马方面也很少有表明与中国存在大规模贸易的证据存世。因为中国丝和寇丝非常接近,研究者在决定一片丝织品来自于中国

^① 林英、迈特里希(Michael Metlich),《洛阳发现的利奥一世金币考释》,《中国钱币》,2005年第3期,第70—72页。

^② 见《后汉书》,中华书局版,卷118,第2920页。拉西克在《罗马与东方贸易的新研究》讨论了学者们关于这个记载的许多质疑;见第853—855页,注848、849、850。

时必须识别出只有中国才有的纹样。但是由于纹样是可以被复制的,最能可靠地表明是中国产品的标志就是汉字的存在。在叙利亚帕尔迈拉(Palmyra)发现的公元1世纪和3世纪之间的丝织品,可能是从中国流传到西亚的最早的中国丝^①。

许多在欧洲发现的标为“中国”的丝织品其实是拜占庭的。一位学者研究了1千份7世纪至13世纪之间的此类丝织品,发现只有一份是在中国制造的^②。中国的艺术在唐代的时候吸收了大量外国的主题,而在汉代则很少表现有外来的主题^③。第一次可认定的中国和罗马——其实是中国西部和罗马帝国东部边缘——之间的联系是在公元3至4世纪,这也是本书开始的时间^④。

本书以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尼雅和楼兰为始点。这两个地方是中国西北部出土大量汉语及犍陀罗语文书年代最早的两个考古遗址。犍陀罗语最初是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犍陀罗(Gan-

① 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带有汉字铭文的丝绸》(Die Seiden mit chinesischen Inschriften),收康利讷特(A. Schmidt-Colinet)、斯特孚(A. Stauffer)、阿萨德(L. Al-As'ad),《帕尔迈拉的纺织品:新旧发现》(Die Textilien aus Palmyra, Neue und alte Funde),察贝恩(Philipp von Zabern)出版社,2000年。参见梅维恒的书评,载《东方学研究文献》(Bibliotheca Orientalis),第58卷(2001年)第3—4期,第467—470页。与其他出土中国纺织品比较过后,罗泰将编号为521的纺织品的纺织年份定为在公元50年至150年之间,亦即在西方发现年份最早的丝织品之一。无疑两件纺织品都是在公元273年帕尔迈拉被萨珊帝国攻陷前生产的。亦可参看罗泰,《不重要的不了解:异国环境里的中国文字》(Inconsequential incomprehensions: Some instances of Chinese Writing in Alien Contexts),载《物》(Res: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and Aesthetics),第35期(1999年),第42—69页,尤其第44—52页。

② 穆迪修斯(Anna Maria Muthesius),《公元1200年之前地中海丝绸贸易对西欧的影响》(The Impact of the Mediterranean Silk Trade on Western Europe Before 1200 A. D.),收《贸易中的纺织品》(Textiles in Trade),美国纺织学会(Textile Society of America),1990年双年会会议报告,第126—135页;在第129页,作者提到荷兰马斯特里希特(Maastricht)市的圣瑟法斯(St. Servatius)大教堂的一个圣物箱中只藏有一件中国纺织品。亦可参看刘欣如(Liu Xinru),《丝绸与宗教:对公元600—1200年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思想的探究》(Silk and Religion: An Exploration of Material Life and the Thought of the People, AD 600—1200),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页。

③ 与齐东方于2006年6月的电话讨论。有关一个重要的例外,可参见李安敦(Anthony J. Barbieri-Low),《一组东汉漆器中的罗马主题》(Roman Themes in a Group of Eastern Han Lacquer Vessels),《东向》(Orientations),第32卷(2001年)第5期,第52—58页。

④ 拉西克,《罗马与东方贸易的新研究》,第625页。

dhara)地区的语言。这些文书揭示出当地的经济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只有非常少量的包括王室成员和逃亡者等外来人口会使用钱币、丝、或贵金属来购买他们所需的物品。

从犍陀罗来的移民带来了佛教的教义,并用其自有的佉卢文(Kharoshti)记录下来。这些早期的佛教徒并不遵守所有的寺院清规。尽管佛教的戒律规定僧尼必须要独身,但尼雅文书表明许多佛教徒都结了婚,并且和他们的家人住在一起,而非独身住在的寺院中(第一章)。

库车是第二章探讨的对象,亦是中国著名佛教译经师鸠摩罗什的故乡(值得指出,罗什也没有过独身的禁欲生活)。鸠摩罗什是说当地方言库车语(即龟兹语)长大的,但他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学习梵文,并在他被虏获到中国的17年时间里学习了汉语。他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考察在丝路上使用的多种语言,并研究哪些是应用在寺院中的,哪些则是为了行政管理所需要的。

在丝路贸易的高峰期,来自撒马尔罕地区的粟特人是在中国最重要的外国人社群。本书的第三章就是以他们为探讨对象。我们未必会联想到中国是一个欢迎外国人的国家,但是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尤其是在伊斯兰军队征服粟特人的家乡撒马尔罕之后,大量外国人会移居到中国。许多粟特人会以商人、农民、或旅馆店主的身分定居吐鲁番(第四章的探讨对象)。他们之中一个小名“鸵鸟”的人还是一名兽医^①。当唐朝军队终于在640年攻占吐鲁番这个绿洲聚居地之后,他们将当地居民(包括中国人与及非中国人)都登记在户籍上。他们也听取有关用粟特语(而非汉语)签订的协议的纠纷,并且为那些不能说汉语的庭上证人提供翻译。

近年来最令人兴奋的考古发现要数在唐代都城长安发现的外国居民的坟墓(第五章探讨的对象)。从伊朗世界来的粟特移民将他们

① 吴震,《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出土材料中所见的“胡”人》(“Hu” Non-Chinese as They Appear in the Materials from the Astana Graveyard at Turfan),《中国与民族研究论丛》(Sino-Platonic Papers),第119号,2002年。

的索罗亚斯德教信仰带到了中国。当他们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崇拜火坛的火,并且用动物来供奉他们的神灵。当他们去世之后,他们的家属会为他们准备去往另一个世界。家属们将死者的尸体暴露给食肉的动物,让它们清除骨头上的被认为会玷污土地的血肉,然后将死者入殓。尽管大多数的粟特人信奉索罗亚斯德教,该教清楚地规定尸体入殓前必须要彻底清洗骨头,但一些住在长安的粟特人在6世纪晚期和7世纪早期的时候选择了中国式的埋葬方式。他们的坟墓巧妙地将一些索罗亚斯德教的主题(例如火坛)使用在中国式的棺床上。2005年秋天,在这些粟特人墓群的旁边发现了一座印度婆罗门(brahman)的墓。令人好奇的是,这座墓竟然也显示有火坛,这表明死者可能在伊朗社群中吸收了索罗亚斯德教的信仰。

755的安史之乱几乎导致了唐朝的覆灭。安禄山的母亲是一个突厥人,父亲是一个粟特人,他在起兵前在唐朝军队中担任节度使之职。唐朝廷为了对付叛军,撤回了驻在中亚的军队。供应中国军队的大量军费突然停止,中亚同唐代中国的联系也就这样急剧减少了。

第六章讨论的敦煌藏经洞的数千件文书,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了解9至10世纪(即在该藏经洞在11世纪初被封上前)的佛教寺院生活。无论是在786年至848年的吐蕃统治时期,还是在随后的声称忠于中原王朝的一系列当地统治者统治时期,敦煌的居民几乎都是以实物交换的形式进行着所有的经济交易行为。敦煌也是一个佛教中心,有着13或14座佛教寺院。敦煌藏经洞的壁画很显然是保存最好的,最大规模的佛教场所,它们证明了制作出如此精美艺术品的当地居民和统治者对佛教信仰的热忱。如同几个世纪之前的尼雅那样,敦煌的许多僧人也是住在家里而非住在寺院里的。

敦煌的统治者在848年之后与丝路南线临近尼雅的绿洲于阆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是第7章要讨论的中心。敦煌藏经洞以及于阆周边的城镇发现了大量的于阆语文书,于阆语是一种大量借用梵文词汇的伊朗语言。但奇怪的是,在于阆本地没有发现这样的文书。这些文书能够让我们观察到于阆语的学生是怎样学习在大多数寺院中使用

的梵文,以及对所有去往中国的旅行者有用的汉语的。于阆在1006年被伊斯兰世界征服,这也是丝路上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地方。

如同今天的游客能看到的那样,新疆是极其伊斯兰化的。本书的结论部分考察了该地区自伊斯兰教到来后的历史和贸易。最后的一部分为今天的旅行者提供了关于一些最值得看的重要地方的建议。

本书每一章都会以一个丝路遗址为重心,并就每一个地方提出相同的问题:新发现的文书究竟有什么新的揭示?为什么它们会被遗留在被找到的地方?这些文书是在什么情况下被保留下来,是任何严谨的历史分析都必须提出的问题。本书每一章都会利用到壁画及其他文物提供的视像材料。本书的目的是要勾勒出每一个社区的主要历史事件、描绘出居住在那里的不同社群以及略述当地贸易的性质;其最终目的则是要在丝路上其中一个交易最频繁的货品——即循环再用纸张——上面写出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

目 录

总序: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趋向	伊沛霞	1
前言	单国铨	1
中国历史的结构	施坚雅	1
内亚史上的国家形成与阶段划分	狄宇宙	33
中世性与中国人的历史观	卜正民	71
“早期现代性”作为纪元概念与清代思想史	伍安祖	91
《文化与权力: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夏世界的瓦解与重建》序	裴士凯、司白乐、伊沛霞	117
《丝路新史》序	韩 森	153
750—1550 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及社会转型	郝若贝	175
宋、元、明的过渡问题	史乐民	247
帝制晚期文化的经济及社会基础	罗友枝	287
整合史:早期现代(1500—1800 年间)的平行发展与相互 联系	傅礼初	321
中国治权的多面性	柯娇燕	355
对帝制晚期中国经济的反思:1730 年前后—1930 年间的 发展、崩解和衰退	彭慕兰	377
作者简介		439
译者简介		445

CONTENTS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G. William Skinner	1
State Forma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Inner Asian History	Nicola Di Cosmo	33
Medievalty and the Chinese Sense of History	Timothy Brook	71
The Epochal Concept of “Early Modernity” and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On-cho Ng	91
Introduction to <i>Culture and Power in 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Chinese Realm, 200—600</i>	Scott Pearce, Audrey Spiro, Patricia Ebrey	117
Introduction to <i>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i>	Valerie Hansen	153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Robert M. Hartwell	175
Introduction: Problematizing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Paul Jakov Smith	247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Late Imperial Culture	Evelyn S. Rawski	287
Integrative History: Parallel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1500—1800	Joseph F. Fletcher, Jr.	321
The Rulerships of China	Pamela Kyle Crossley	355
Re-thinking the Late Imperial Chinese Economy: Development, Disaggrega- tion, and Decline, circa 1730—1930	Kenneth Pomeranz	37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中古史卷/伊沛霞,姚平,单国钺
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1
ISBN 978-7-5325-6225-1

I. ①当… ②中… II. ①伊… ②姚… ③单… III. ①汉
学—研究—世界—文集 ②中国历史:中古史—文集
IV. ①K207.8-53 ②K24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1476 号

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

伊沛霞 姚平 主编

中古史卷

单国钺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 插页 6 字数 400,000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7-5325-6225-1

K·1489 定价: 5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